

佛學研究與方法論

對現代佛學研究之省察

吳世鈞

(續上期)

由此可見，對於同一的資料，不同的方法可以各自決定研究的姿態與成果，這在佛學研究中，是相當普遍的現象。而一個學者，亦可同時以多種的方法，以進行研究。如上面提到的山口益，和宇井伯壽。但他們較能掌握到文獻學的方法，故在這方面的研究亦有較優越的表現。西方的抗塞（E. Conze），精通般若文獻，對般若文學的研究，可以說是無出其右。但他缺乏哲學的基本訓練，未能掌握到佛教的根本觀念，故談起佛教的義理，便顯得有點弱脆。

有關佛學研究方法論一點，我們討論至此。下面即以方法論

為線索，介紹及評論日本及歐美的佛學研究的表現。我們的重點並不是要作橫面的鋪陳，而是選其有代表性的說說而已。

三、文獻學方法

文獻學是文字資料研究之事。它的一般工作項目是校訂整理資料的原典，把它出版。將原典與其他的譯本作一文字上的比較研究。據原典或譯本將之翻譯成現代語文。又加上詳盡的註釋，這註釋的內容，可以是多方面的，舉凡字義、文法、歷史、思想、文學等等無不可包括在內。又可做一原典語文與譯本語文的字彙對照。最後則是造一總的索引，俾便查考。

這種工作，需要很多方面的知識；而語言學（Philology）與

目錄學 (Bibliography) 尤為其中的基柱。特別是前者，更是一切之本。故語言的知識不夠，便很難做這種學問。

現代的佛學研究，特別是西方者，幾乎全是文獻學的研究。

西方學者的特重文獻學，可以追溯至西方學術傳統的一個習慣，即是，對於古希臘羅馬的研究，不管是有關哲學的、宗教的和歷史的問題，都以語言學的研究為其基點。這個習慣影响到佛學研究上，使之走上文獻的路數。另外一點是與學者的基本訓練有關。佛學研究可以說是西方學者研究古拉丁文希臘文典籍之餘的表現。學者在這種學術傳統中，早已培養就一種對古拉丁文希臘文典籍的出版、翻譯和分析的訓練和研究方法，他們即把這種訓練和方法，很順適地應用到佛學研究上去，特別是研究佛學原典的梵文與巴利文經典方面。故我們很容易理解到，西方學者坐下來作佛學研究時，面對着一大堆義理眉目尚未清楚而又用繁雜的語文來記述的經典資料，他們先要着手的，自然是運用自己所擅長的語言學的方法，來掌握梵文巴利文的文法，出版和翻譯梵文和巴利文的原典了。

在資料方面，西方的佛學研究，一向都集中在印度方面的梵文巴利文的原典上，其後才注意到西藏文的翻譯和文學，對漢文資料則未加措意。這自然是就比較來說。這一現象亦自可透過語言學的因素來解釋。因印度系的語言，原屬印歐語系中的印度伊朗語派，在比較文法學上，稱為古印度雅利安語 (Ancient Indo-Aryan)，它與歐洲語言有很密切的關係。這種語言學上的親和性，很自然地使西方學者的注意力，引到梵文巴利文經典的研究上去。

另外一個因素涉及政治的目的。近代的歐洲國家實施海外殖民政策，它們的興趣雖然主要在於經濟方面，但為了要鞏固統治，故對該地的文化歷史亦要有相當的認識。印度、錫蘭和東南亞的國家，都會是英、法的殖民地。這些國家的古代語文，都會受到注意。就與佛教的關係言，則是梵文與巴利文。這亦促使這兩種語文的原典，成為西方佛學研究的重點。

我們在開首說奠立西方佛學研究的語言學的文獻學基礎的，

是法國的布奴夫，這說法並不過分，他是開始以嚴密的語言學來研究和翻譯佛典的一人。早在一八二六年，他已與拉仙 (Chr. Lassen) 編就歐洲第一本巴利文辭典了^{①9}。他研究過不少大小乘經典，包括「法華經」與「長阿含經」 (Dighanikāya)，曾把前者翻譯為法文。他不但重視代表印度正宗佛教的梵文巴利文經典，又留意其他方面的資料，這包括錫蘭文、緬甸文、暹羅文和西藏文的翻譯和解釋。另外，他又不忽畧印度雅利安語文，例如孟加拉文。加上在比較語言學方面的心得，他實在是一個語言學的大才。

當然，當時致力於佛學或梵文巴利文的研究的，並不止布奴夫一人。與他同時期，即有一丹麥語言學家拉斯克 (Rasmus Kristian Rask)，訪問過錫蘭，收集得大批巴利文的抄本。他後來寫了一本巴利文法書。他把收集所得帶回哥本哈根，使該地一時成了歐洲極為重要的巴利文研究中心。

繼布奴夫之後，西方佛學研究界出現了很多文獻學大師。他們的範圍，包括對梵文原典、巴利藏經和西藏藏經的研究。亦有涉及漢譯的文獻的；例如比利時的普山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把「成唯識論」翻譯為法文^{②0}，及法國的拉莫特 (Étienne Lamotte) 把「大智度論」翻譯為法文^{②1}。這些大師們，在他們自己專長的範圍內，恐怕不少已超過布奴夫的成就。但總的來說，他們的研究方法與方向，仍不出布奴夫所奠下者。即是說，基本上還是依循着出版、校訂、翻譯、註釋、字彙、索引這一條文獻學的工作路線上走，而尤置其重點於現代語文（如英、法、德語）的翻譯^{②2}。在本文第二節中我們談到方法如何影响研究的重心與成果一問題，所舉「迴諍論」的研究一例，學者所表現的文獻學方面的研究，亦可使人見出這種研究的一斑。

西方的文獻學式的佛學研究所得的成果，實在是一個汪洋大海，一時難以盡述，抑這亦不是筆者及本文所能作到的^{②3}。實際上，筆者以為，即使充量加以羅列介紹出來，對本文所要進行的省察工作，並無多大的積極意義，這無寧只是一種量的堆砌而已。重要的是要了解這種文獻學的方法的本質，其功用與限制。

日本的現代佛學研究，起步比較遲，但其研究方向，基本上還是與西方的相同，即亦是文獻學的方法。上世紀七十年代，南條文雄到英國牛津遊學，習得梵文與西方的語言學的方法。其後高楠順次郎又到牛津，廣習梵文與巴利文。這兩人在日本所開出的路向，成了日本佛學研究界一貫所行的方式。南條比較偏重梵文原典與漢譯的文獻的研究，他編輯過所謂「南條目錄」的「大明三藏聖教目錄」，這是一種漢譯藏經的全面整理，卷首附序論、參照書目，卷尾又有印度的著作者、漢譯者、中國作者的解說目錄及其索引。這目錄其後成爲海外漢譯大藏經研究者的指針。另外，南條自己又翻譯及刊行了不少梵文經典，恐繁不錄。高楠則兼重漢譯藏經與巴利經典，他曾參予製定出版「大正新修大藏經」，又出版「南傳大藏經」，又翻譯了一些梵文原典爲現代語文。兩人雖都以西方爲師，但所表現的魄力，似乎尤有過之。

事實上，日本佛學界在迄今這一百年中所表現出來的成果，從廣度上言，規模似乎較西方爲大。日本的文獻學者們，學得了西方那種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又通曉基本語文，如梵文、巴利文與藏文。另外，他們對了解漢文經典方面，有絕對的優越條件，能運用這方面的資料，這則非西方學者所能及。

另外一個有利的條件是緣於地理因素。由於日本學者多聚居於自己的國家，不如歐美學者的分散於各國，故日本佛學界常有集體合作進行學術研究的事，這種研究方式，倘若合作得宜，很能發揮個人自身的長處；而日本也實在是一個十分講究紀律性的民族！故研究的成果十分可觀²⁴。日本很多優秀的「佛學辭典」之得以編成，也是透過這種方式而來的²⁵。這種現象在西方便比較少見。在翻譯佛教原典方面，日本的這種集體合作方式，也有過很廣泛的表現。近年他們似乎有這樣一種風氣，要本着科學的語言學的立場，以現代的文獻學的基本訓練，不大依賴漢譯，而直接將印度佛教的梵文與巴利文原典加以全面的文獻整理，重新將之翻譯成現代流暢的日本語。這不只有學術價值，而又可兼顧及使佛學流通於社會的普及性方面了²⁶。

附註

¹⁹ E. Burnouf et Chr. Lassen, "Essai sur le Pali ou langue sacrée de la presqu'île au-delà du Gange", Paris, 1826.

²⁰ "Viñāpimātratāsiddhi, La Siddhi de Hiuan-Tsang".

²¹ 此非全譯，只譯了二十七卷。

²² 此中當然有些例外。例如翻譯「成唯識論」的普山，他亦很能注意佛學中的一些重要觀念的哲學含義，如業、三身、緣起等。但這總是少數。

²³ 杜容 (J. W. De Jong) 有「歐美佛學研究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 Eastern Buddhist, New Series, Vol. VII, No. 1, 2, 1974.) 一文，報告西方佛學界文獻學的研究成果甚詳。杜容的這篇文章，實可以說是用廣義的目錄學的方法來寫的。從此中讀者可以窺見西方的佛學研究的輪廓：甚麼學者有些甚麼研究，甚麼經典有甚麼學者去研究。作者不時也作些文獻學式的評論。讀者從中亦不難嗅到杜容自己的文獻學的風格。

²⁴ 一個很顯明的例子是對「肇論」的研究。按對於僧肇這部作品結集的研究，德國學者李賓泰 (Walter Liebenthal) 數十年前已作過好些努力，作了敘論、翻譯、注釋、考證和索引等工夫，而成就 "Chao-Lun: The Treatises of Seng-chao" 一書。其後在日本方面，塚本善隆更領導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一組成員，對「肇論」作更全面的研究所。這是專家們各自發揮自己所長的結果，其成績自然超過李賓泰的。

²⁵ 例如望月信亨主編的「佛教大辭典」和龍谷大學編的「佛教大辭彙」。近出的又有中村元主編的「佛教語大辭典」。較小規模的如水野弘元監修的「新佛典解題事典」，這是以現代學術觀點，握要介紹重要的佛教典籍的解題書。其內容項目包括一切經、印度佛教、西藏佛教、中國佛教、日本佛教及印度聖典各面；書後並分門別類介紹現代人所寫的佛學研究書籍；最後又附有中日文索引和羅馬字（包括梵文、巴利文、藏文、英文等）索引等。這書與上舉的「佛教大辭彙」比較，可算是小巫，但執筆者却亦達五十二之數。此方面最顯著的莫如長尾雅人、梶山雄一所主持的「大乘佛典」的編譯工作。此項工作目前完成了對印度大乘佛學的重要經典及龍樹世親的論典的編譯。此一表現的成果，在日本學界內外，評價都很高。

²⁶

(未完待續)